

明清小品丛刊

[清]余怀著

板桥杂记
(外一种)

李金堂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清小品丛刊

〔清〕余怀 著

板桥杂记
(外一种)

李金堂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板桥杂记:外一种/(清)余 怀著;李金堂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
(明清小品丛刊)
ISBN 7-5325-2833-2

I. 板… II. ①余…②李… III. 小品文-作品集-
中国-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8357 号

明清小品丛刊

板桥杂记(外一种)

[清]余 怀 著

李金堂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 插页 4 字数 106,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25-2833-2

I·1425 定价:8.7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散文,自先秦发源,中经汉魏六朝、唐宋,发展到明清,已经进入了其终结期。这一时期,尤其是晚明阶段,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文坛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散文园地,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像先秦诸子、唐宋八家那样的天才巨子,但也是作者众多、名家辈出;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庄子》、《韩非子》一类以思理见胜的议论文,《左传》、《史记》一类以叙述见长的史传文,以及韩柳欧苏散文一类文质兼胜的作品,但也有新的开拓和发展,散文的题材更加丰富,形式更加自由,从对政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更多地转向对人生处世、生活情趣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又一个以文体为特征命名的发展时期,这就是文学史上习称的明清小品文。

小品的名称并不自明清始。“小品”一词,来自佛学,本指佛经的节本。《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浩)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可见,“小品”本来是就“大品”相对而言,是篇幅上的区分,而不是题材或体裁的区分。小品一词,后来运用到文学领域,同样也没有严格的明确的定

义,凡是短篇杂记一类文章,均可称之为小品。题材的包容和体裁的自由,可以说是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准确地说,“小品”是一种“文类”,可以包括许多具体的文体。事实上,在明人的小品文集中,许多文体,如尺牍、游记、日记、序跋,乃至骈文、辞赋、小说等几乎所有的文体,都可以成为“小品”。明人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就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散文、韵文的文体。尽管如此,从阅读和研究的习惯来说,小品文还是有比较宽泛的界定,通常所称的小品文,主要还是就文体而言,指篇幅短小、文辞简约、情趣盎然、韵味隽永的散文作品。

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兴盛,在明清时期,主要在晚明阶段。而小品文的渊源,则仍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论语》、《孟子》、《庄子》等书中一些精采的短章片断,可以看作是后世小品文的滥觞。六朝文人的一些书信、笔记之类,如《世说新语》中所记的人物言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读〈世说新语〉》),更是绝佳的小品之作。唐代小品文又有长足发展。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堪称山水小品中的精品。晚唐时期,陆龟蒙、皮日休、罗隐等人的小品文,刺时讽世,尖锐深刻,在衰世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宋代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不少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而其中代表宋代文化最高成就的苏轼,就是一位小品文的巨匠。苏轼自由不羁的性格,多方面的文化素养,使小品文这种文体在他手中运用自如,创作出大量清新俊逸之作,书画题跋这一体裁更是达到了极致。以致明人把他推为小品文的正宗,编有《苏长公小品》。宋代兴起的大量笔记,不少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小品文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NADZI / 10

把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加以定名,并有大量作家以主要精力创作小品文,从而使小品文创作趋于繁荣,还得到晚明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有不少作家把自己的著作径以“小品”命名,如朱国祯的《涌幢小品》、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等;还出现了不少以“小品”为名的选本,如王纳谏编《苏长公小品》、华淑编《闲情小品》、陈天定编《古今小品》、陆云龙编《皇明十六家小品》等。而作为小品文达到鼎盛阶段标志的,还得推当时出现的许多具有很高文学成就的小品文作家,如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和江盈科为代表的“公安派”作家,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作家,以及同时或稍后的屠隆、汤显祖、张大复、陈继儒、李日华、吴从先、刘侗、张岱等,均有小品文著述传世。晚明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在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艺术上极富创造性。晚明小品虽然在思想内涵和历史深度方面,无法与先秦两汉散文、唐宋散文等相比;但在反映时代思潮、探寻人生真谛方面,同样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晚明小品文的兴盛,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风尚和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市民意识的增强,是晚明小品文兴盛的重要原因。明亡之后,天翻地覆的巨变使社会思潮产生了新的变化,晚明的社会思潮和文学风尚得到了新的审视;同时,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正统文学思潮的冲击,小品文的创作也趋于衰微。但仍有一部分作家仍然继承了晚明文学的传统,创作出既有晚明文学精神又具时代特色的小品文,如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梦影》、余怀的《板桥杂记》、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等,或以其潇洒的情趣,或以其真挚的情怀,为后人所激赏。

明清小品文不仅是中国古典散文终结期时的遗响,而且也是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转换中的重要一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不少散文作家都喜爱晚明小品,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甚至认为晚明文学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些相似之处。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更曾掀起过一阵晚明小品的热潮。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作家大力提倡小品与幽默,强调自我,主张闲适,甚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林语堂等人的观点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批评。但鲁迅先生对小品文本身以及晚明文学的代表袁宏道等并不持否定态度,而是认为“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不够”(《一思而得》)。鲁迅先生是把战斗的小品比作“匕首”与“投枪”,他晚年以主要精力创作杂文,正是重视小品文作用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阵小品随笔热,明清小品的价值在尘封半个世纪之后重又为人们所发现,并开始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估。为了使广大读者对明清小品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给广大读者提供较好的阅读文本,我们特出版了这套《明清小品丛刊》。

本丛刊精选明清具有较大影响和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小品文集。入选本丛刊者,系历史上曾单独成集者,不收今人选本。入选的小品文集一般根据通行本加以校勘,所据版本均在前言中予以注明。一般不出校记,重要异文则在注中注明。由于明清小品文作者多率性而作,又多引用前人诗文及典故,所论又多切合当时社会风尚,为给读者阅读提供参考和帮助,

特对入选的小品文予以简注,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典故、术语加以简明的注释,语词一般不注。明清小品文集的校注工作是一项尝试,疏误之处当在所不免,殷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

《板桥杂记》与《三吴游览志》的作者余怀(1616—1696),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一号广霞,又号壶山外史、寒铁道人,晚年自号鬢持老人。原籍福建莆田,长期寓居南京。因此,常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

余怀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七月十四日。清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六月二十日(荷花诞日)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尤侗(梅庵)《挽余曼翁八绝句》之二云:“老来健在正堪夸,序齿居然先子牙。何意道场终九九,并非太岁在龙蛇。”(《艮斋倦稿》卷九)

余怀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末清初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他的一生,经历十分曲折。以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清军占领南京、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616—1645,即余怀三十岁前。他熟读经史,学识渊博,有匡世之志,文名震南都。南京国子监(南雍),规

模巨大。为参与南都乡试,东南数省学子,常聚学于此。余怀亦曾游学南雍。而与试名列榜首者,多为余怀、湖广杜濬(于皇)、江宁白梦鼐(仲调),人称“余杜白”(金陵俗称染色名“鱼肚白”之谐音)。当时,官南京国子监司业的吴伟业(骏公),十分欣赏这位才情俊逸的文学少年,写了一阕《满江红·赠南中余澹心》:“绿草郊原,此少俊、风流如画。尽行乐、溪山佳处,舞亭歌榭。石子冈头闻奏伎,瓦官阁外看盘马。问后生、领袖复谁人,如卿者? 鸡笼馆,青溪社,西园饮,东堂射。捉松枝麈尾,做些声价。赌墅好寻王武子,论书不减萧思话。听清谈、亹亹逼人來,从天下。”(《梅村诗集·诗余》)

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十四年辛巳(1641),由于他才名远播,备受称道,被曾任明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质公)邀入幕府,负责接待四方宾客并掌管文书,如唐代牛僧孺之于杜牧。这时,他二十五、六岁。余怀以布衣入范幕,既表明范对他才干的赏识,也表明余怀与范同有济世之志,而非普通文士可比。

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复社在苏州虎丘召开大会。大会由郑元勋(超宗)、李雯(舒章)主盟。龚鼎孳、方以智、冒襄、杜濬、邓汉仪等复社名流均与会。余怀也参加了虎丘之会。(《社事始末》)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五月,福王朱由崧继位南京,建元弘光。马士英把持朝政,引用阉党阮大铖,排斥忠良,煽构党祸,大肆迫害东林与复社人士。南京成了党争的中心。余怀积极参加了反对马、阮的斗争。后来,他回忆说:“余时年少气盛,顾盼自雄,与诸名士厉东汉之气节,撻六朝之才藻,操持清议,矫激抗俗。

布衣之权重于卿相。”他又说：甲、乙之际，“阖儿得志，修怨报仇，目余辈为党魁，必尽杀乃止。余以营救周（鏊）、雷（缙祚）两公，几不免虎口。”（《同人集》卷二）

余怀辞世以后，尤侗挽诗有云：“赢得人呼余杜白，夜台同看《党人碑》。”前一句写文采，后一句写气节，可为他前半生的写照。顺治二年乙酉（1645）五月，清军占领南京，弘光小朝廷灭亡。余怀的生活经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二阶段：1645—1696，余怀三十岁直至去世。清军占领南京，余怀因而破产丧家。随之而来的，是满族统治者以血腥屠杀为手段强制推行剃发与更换服制的种族文化专制政策。抵抗没有力量，投降无法接受，唯一的出路，就是以道装为掩饰，流亡他乡。长时期的颠沛流离，是他这时期生活的主要特点。从顺治年间直到康熙初年，他经常奔走于南京、苏州、嘉兴一带，以游览为名，联络志同道合者，进行抗清复明的活动。留存至今这时期余澹心的诗歌，在宣泄丧家失国的悲痛、表述抗争复国的壮志，以及流露期盼胜利的心情等方面，均有大量的篇章。

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郑成功在南京城下严重受挫，转而经营台湾；十八年辛丑（1661），明永历帝被吴三桂擒获，次年被杀。与此同时，清政府制造了一系列大案，抗清势力几被摧残殆尽。余怀复明的希望终于破灭。

从康熙八年己酉（1669）起，余怀隐居吴门，以卖文为生。同时，精力集中于学术著作方面。他的老友尤侗写了一阙仿吴梅村的《满江红》，生动描绘了他的落魄凄苦之状：“满目凄凉汾水雁，半头霜雪燕台马。问何如变姓隐吴门，吹箫者？”（《百末词》卷四）他也承认：“颓然自放，憔悴行吟。风流文采，

非复曩时。”(《同人集》卷二)然而,正如他的好友吴绮(园次)所说:“慷慨长怀吊古心,颠狂不改凌云气。”(《林蕙堂全集》卷十四)他忍受着心灵上的巨大苦痛,坚守明遗民的身份,拒不出仕,不与清政府合作。他的许多著作,都不书清朝年号。这种守身如玉的崇高气节,不忘祖国的高尚情怀,十分难能可贵。他家乡的后学称颂他“高风亮节,可比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公”(1936年8月11日《莆田日报》余澹心先生逝世二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余怀文采飞扬,学识渊博,著述等身。由于诸多原因,许多著作未能刊刻流传,终而散佚。现存的除《板桥杂记》与《三吴游览志》外,还有:《甲申集》七卷、《五湖游稿》三卷、《平原吟稿》一卷、《枫江酒船诗》一卷(残)、《七歌》一卷、《咏怀古迹》一卷、《戊申看花诗》一卷、《味外轩诗辑》一卷、《玉琴斋词》一卷、《秋雪词》一卷、《东山谈苑》八卷、《四莲华斋杂录》八卷、《余子说史》八卷、《砚林》一卷、《茶史补》一卷,以及《王翠翘传》、《妇人鞋袜考》、《官闺小名后录》、《寄畅园闻歌记》,还有大批题辞、序跋、批语、尺牍,以及散见的诗词等等。余怀尝入范墓,却未任官职,也未举乡试,终生为一介布衣。但是,他以文章、气节而极有声于时。著名的“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都很称赞他的诗词,王士禛将他的《金陵怀古诗》与刘禹锡并称。以气节著称的姜垚、姜垓、叶襄、僧函可等人是他的知交,以诗文驰名的吴绮、陈维崧、曹溶、曹尔堪等人是他的好友,画家王翬、吴历,戏曲家尤侗、李渔也是他的挚友。《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更是对他的“古道绝学”推崇备至,亟思见面订交。清朝初年诸多诗文集,都选录他的诗作,评价颇高。在他逝世三百周年时,笔者曾撰文指出:“余怀的崇高品德,他诗

文的卓越成就,是我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二

余怀著述虽富,但流传广远而影响巨大的,当推《板桥杂记》。《板桥杂记》著成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下距余怀辞世不到三年。可见这是他倾其心力而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纵观自《杂记》问世以来的历史,从广受欢迎与不断被刊刻的情况看,它确是一部流传三百年而不衰的、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著作。

《板桥杂记》记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长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况及有关各方面的见闻。据《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四,在今南京市白鹭洲公园(明代叫东花园)的南面,明初设有留守后仓。为便利物资的运输,开挖了一条小运河,从仓前逶迤而北、而西,汇合左近诸水,经麦子桥,沿五块砖而入长塘。尔后,为便利行人,在塘边搭板成桥,即长板桥。著名的南京旧院,就座落在长板桥西,大致从东花园之西侧,一直延伸到武定桥边。旧院是明初设立的官营妓院,本名富乐院。它与十六楼都是朱元璋繁荣京师的重要设施。大致在正德南巡前后,十六楼逐渐衰废,但旧院却由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及与贡院隔河相望的位置,而日趋繁荣。天启、崇祯年间,旧院更呈现一种特殊的繁华。尽管当时明帝国风雨飘摇,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社会极度动荡;然而权势之争的重心尽在北京,边患远在辽左,农民军多在陕、豫,南京城高濠深,防御坚固,且有大江作屏障。因此,东南太平无事,南都更趋繁华。

富豪权贵避难南京,以此为乐国;名流贤俊聚会陪都,视斯为乐土。东林遗孤,大会桃叶渡;复社名流,集游秦淮河。他们带着政治上失意的萧瑟心情,在这里寻求温柔的抚慰;他们把安邦定国的锦绣篇章,在这里换成耳鬓厮磨的浅斟低唱。著名诗人吴伟业在《江南好》中吟唱道:“江南好,狎客阿侬乔。赵鬼揶揄工调笑,郭尖僂巧善诙嘲,幡绰小儿曹。”(《梅村诗集·诗余》)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节烈之士与美女仙姬的缠绵故事;在这里,到处都传诵着声讨魏阉余孽的浩然诗章。东林遗忠,复社名流,是旧院的贵客,青楼的佳宾。“胜国晚年,虽妇人女子亦知向往东林。”(《桃花扇传奇序》)而史料证明,明末清初享誉全国的诗人骚客,忠义节烈,几乎无一不去旧院寻访游宴。相反,声名恶劣的阉党权贵,腰缠万贯的佗父巨贾,则常常被远拒于楼门之外,思见一面都不可得。清人秦际唐(伯虞)《题余澹心板桥杂记》云:

笙歌画舫月沉沉,邂逅才子订赏音。

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

“家家夫婿是东林”,最恰当不过地表述了明末旧院繁华的最重要、最富时代气息的特征。于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青楼女子,这些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一下子就与民族兴亡这一最重要的时代主题紧紧联结在一起。而在她们身上被压抑着的追求独立之精神,向往自由之思想,终于迸发了出来。这不能不令权贵侧目,宰辅欠身。因此,旧院美姬的不幸,昔日繁华的毁灭,也就不能不和国家、民族的悲剧命运紧密相联。这正是《板桥杂记》写作最主要的时代背景,也是该著的主题之所在。《杂记》之所以为广大学者与民众所啧啧称道,而成为一部传世杰作,原因就在于此。舍弃了这一点,

便无法理解《板桥杂记》，无法理解它的作者余怀；舍弃了这一点，《杂记》也就沦为《北里志》一类的作品，不过是供人茶余酒后以助谈资，用以醒疲驱睡罢了。

《杂记》的内容十分丰富。简略说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板桥杂记》描述了明季南都的社会生活情况，展示了一幅浓墨重彩的金陵风情画。如《杂记》对名闻天下的南京秦淮灯船作了十分生动而具体的描述，对明末南都教坊梨园情况及有关习俗作了细致的介绍，对南都贵族官僚、公子王孙的奢侈腐朽作了深刻的揭露。

《杂记》对长板桥之环境、妓家衣着、居室、食物、用具、花木等诸多记叙，无一不涉及当时南都社会生活与民俗民情之各方面。尤应注意的是，《杂记》对明末南都诸多名士的订盟结社、诗文之宴，以及因政治失意、党争受挫而出入曲中，日相征逐，选花品妓，流连酒色等，有十分生动的记叙；对吹笛鸣箫，撮管挹弦，击节悲吟，声泪俱迸而倾靡四座的诸艺人的活动，有非常细致的描述。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情况的极其宝贵的资料。谢国桢先生说：余澹心“撰《板桥杂记》，记南都北里旧院逸事，哀感顽艳，足知南都一时风俗……。明季南都社会情况，缕述无遗。”（《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二十一）陈寅恪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时，只要稍有涉及，就征引《杂记》的记叙，以为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又“颇饶趣味”。（《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第四章）

第二，《板桥杂记》记叙了明末南都众多名妓的情况，称赞了她们的美丽、聪慧、有才学、有识见，热烈颂扬了她们中一些人通晓民族大义，有崇高的气节与献身精神。在作者笔下，这些柔弱女子虽不幸沦落教坊，隶属乐籍，身份低贱，但一个个

年轻貌美,毫无轻浮、淫艳的味道。她们或工诗文,或擅丹青,或习器乐,或善歌舞,可谓聪颖过人。更可贵的是,她们重感情,轻钱物,侠肝义胆,爱憎分明。她们中有的人,如李香、葛嫩,能坚守民族大义,临危不惧,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她们的民族气节,她们的献身精神,是那些拜倒在异族统治者脚下,剃发换装,叩首称臣的须眉所难以相比的。至于那些丧尽天良、为虎作伥者,那些以血腥屠杀本族同胞来换取顶带花翎、功名利禄者,在这些可敬可佩的女子面前,则连粪土都不如。《杂记》记叙了如此众多出身卑贱弱女子的优良品德与崇高气节,在中国古代史学与文学史上,完全称得上是一种首创。当然,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命运是十分悲惨的,如葛嫩的玉碎,董白的早夭,寇湄的沉沦,李香的飘零……即使如顾眉,也背负着难以挣脱的传统习俗的巨大压力。然而,描述她们光彩夺目的群体形象,颂扬她们对命运的抗争精神,是我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一部分。

第三,《板桥杂记》抒发了作者余怀对故国文化的无限情思,深刻揭示了明朝灭亡的社会背景,尖锐批判了清朝统治者的血腥暴行。在《杂记》中,作者毫不掩饰他的亡国之痛,“黍离”之悲。在追述昔日旧院诸多见闻中,他感情十分强烈,常常不能自己而慨然泣下。其孤怀遗恨,真可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历史地看,如实地看,作者这种对往昔的怀念,是对故国的无限情思,是对过去长期生活的南都文化氛围的深深眷恋,当然也是对清朝统治者野蛮疯狂屠杀的抗议,对用残酷暴力手段去摧折数千年汉民族文化习俗的抗议。余澹心对旧院在甲、乙之后的巨大变化,痛切陈词:“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他不同意以《杂记》为“狹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的

看法,明确指出:“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应该说,恪守民族大义,对民族文化遭受巨大破坏深怀无限悲痛,才是余澹心写作《板桥杂记》的根本原因。

《三吴游览志》作于清顺治七年庚寅(1650)。关于《三吴游览志》的内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进步书局编辑出版该书之时,曾提要云:“怀放情丘壑,大有阮嗣宗登山临水、竟日忘归之概。是志随见辄记,感触兴怀,发为歌啸;视陆剑南之《入蜀记》有事无诗,差为胜之。所谓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也。尺幅千里,此之谓矣。”

《三吴游览志》记叙余怀于该年四月初一从南京出发,途经句容、奔牛、无锡,到达苏州、松江、太仓一带进行游览,直至六月十九日,移舟陆墓为止。全篇有记游,有宴集,有咏诗,有论史,可谓随见辄记,有感即发,孤行一意,全由性情。因此,诗文错杂,颇多情趣,读来饶有兴味,也充分展现了余怀广博的才学与卓越的识见。

是时,江南一带的反清武装斗争已遭残酷镇压,吴易、陈子龙、夏完淳、黄毓祺等先后殉难,但抗清暗流仍然波涛汹涌。广大东南、西南地区大规模抗清武装斗争,由于金声桓、李成栋的失败,特别是何腾蛟、瞿式耜的英勇殉国而遭受严重挫折,而更大规模的抗清斗争高潮正在酝酿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江南一带的士子们,又重新活跃起来,组织各种诗社,进行公开交往。如慎交社、同声社、惊隐社以及莲社、望社等。顺治七年春,吴伟业倡议,合慎交、同声诸社,于嘉兴南湖立十郡大社,集太仓、松江、昆山、苏州、嘉兴一带十郡之名士。与会者连舟数百艘,为入清以来规模之空前。(《吴梅村年谱》)吴伟业实际上已成为江南文坛的盟主,海内士子的领袖。余怀